

“岂寻常风义所可限哉”——李大钊与章士钊的交谊

王世儒

(北京大学 图书馆, 北京 100091)

摘要:李大钊和章士钊交谊深厚,他们不但经历了在日本的相识、相知,而且经历了在北京的互助合作。尽管后来因为政见分歧二人分道扬镳,但他们的私人挚情仍然俨如清塘,清澈可鉴。这段交谊既是美好人性的展现,也彰显了二人的人格魅力。

关键词:李大钊;章士钊;交谊

中图分类号:C912.11;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4-0022-0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4.004

“Incomparable Friendship for the Common Ones”:

Li Dazhao and Zhang Shizhao

WANG Shi-ru

(Libra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and Zhang Shizhao are very good friends. They met and got to know each other in Japan, then they assisted and cooperated in Beijing. Even though they diverged in their path for different political opinions later, their personal friendship were as clear as a clean pond. This friendship reflects the splendid human nature and their charming personality.

Key Words: Li Dazhao; Zhang Shizhao; friendship

章士钊在张次溪编写的《李大钊先生传》一书《序言》中曾写道:“次溪谓守常(李大钊)身后,凡营葬、募捐诸事,余妻(吴弱男)曾为出力,意不过是寻常风义,然次溪视寒家与守常之交谊,岂寻常风义所可限哉!”于此深切表明,章士钊与李大钊之间有着非比寻常风义之交谊。

章、李二人,原本互不相识,了无瓜葛。他们相识进而结为挚友,是1914年在日本东京开始的。关乎此,章士钊曾有详细的文字记述,谓:“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

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1]自是时起,两人在日本东京密切往还二年余,李大钊在《甲寅》月刊先后发表了《风俗》《国情》等四篇文章,并结识了陈独秀、高一涵等人。这一期间,两人大约每月会晤一次,有时并在章寓共饭,故后来有之说。

1916年春,李大钊为参加国内的反日讨袁斗争,辍学回国。于同年8月应汤化龙、蒲殿俊等之约,在北京出刊《晨钟报》并曾任该报编辑主任,但因与蒲殿俊等人的谈政臭味不合,不久

作者简介:王世儒(1936—),男,北京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北京大学校史人物研究。

即辞离该报。同年底,闲居北京的章士钊不甘寂寞,乃思再作冯妇,决定发行《甲寅》日刊,遂再次约请李大钊一起共事,李大钊当即同意,不遗余力与之通力合作。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的:“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又说,此刊的出版“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出版发行约八个月的时间,“彼此都觉厌倦,因将《日刊》停止”^[1]。从章士钊的这一段话里可知,两人的再次合作李大钊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在此应该加以说明的是,章士钊当年在日本创办《甲寅》月刊,以及后来在北京发行《甲寅》日刊,都有其“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的企求。《甲寅》月刊时期,章士钊即以约请时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为其得力协助者,早在那时期,曾在《甲寅》月刊发表论文者先后已有李大钊、胡适、高一涵、吴虞、杨昌济等诸多名士,到了《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与高一涵等已成为主要撰稿人,“当时高李齐名”,名满域中,“海内号甲寅派”。可以这样说,章士钊创办《甲寅》,结交了四海名士,逐渐网罗并成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思想维新的人物,使他们通过《甲寅》步上了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甲寅》的创刊发行,为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奏响了前奏。当《甲寅》创刊初期,远在欧洲游学的蔡元培见到第一期后,曾写信向吴稚晖赞许说:“行严(即章士钊)发行之《甲寅》……诚佳,其加注之法,拟仿行之。”^[2]足以说明,是时的章士钊及其创办的《甲寅》,堪称已具有“新”与“奇”的特点,与其后来的复古的《甲寅》,不宜一概而论,这在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很受瞩目。这一点,在章士钊进入北京大学执教之后,可以看到更为有力的证明。

1917年8月,章士钊停办了《甲寅》日刊,通过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向蔡元培校长表示,愿入北大任逻辑学教授。蔡元培自然表示欢迎,当即发文延聘章士钊为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章士钊作为一名逻辑学教授,在讲授逻辑

学时,颇受北大及京师学界的赞赏、欢迎。据其门人高承元后来的回忆:“七年先生(指章士钊)讲逻辑于北京大学,时承元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兼为北大旁听生,闻讯喜出望外,趋往则门户为塞,坐无隙地,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3]于此可知,章士钊当年在北大讲授逻辑学是深受欢迎和追捧的。

章士钊在应聘北大逻辑学教授的同时,还兼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他曾明确表示说:“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4]他的这一表述,碍难令人赞同。须知图书馆管理是一门科学,作为一所大学图书馆的一馆之长,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勤奋的尽职履责精神,是难以作出出色的成绩的。但是关于这一点,当时以及后来的学界人士似乎却有体谅,甚至有说法以为其所以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章士钊本人后来也曾明确说出原由,谓“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北大得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实现其“临淮治军”的夙愿。也就是说,这是为能推荐李大钊进入北大任职,铺设一条道路而已。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校长蔡元培、学长陈独秀的荐介,李大钊进入了北京大学接替章任图书馆主任。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李大钊对于管理一个大学图书馆,也并未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管理技能,为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还需章士钊有扶上马再送一程的相助。当年的有关相助情形,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女士曾有回忆介绍说:“我寓北京时,常向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守常亦时来访行严就所拟向国外订购之图书,评鹭当否,……守常亦偶因馆员所草拟之购书西文函电不能当意,就我斟酌修改,……如是者三年余。”^①

更令人感念无已的是,为帮助李大钊尽快开拓工作局面,章士钊与其夫人吴弱男还向北大图书馆无偿捐赠了一大批书刊。这是因为李

① 吴弱男:《李大钊烈士数事》(未刊稿),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件。

大钊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夕,那时北大学子的求知欲空前迫切、热烈,对国内外的新书报刊有强烈的阅读需求,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对于及时订购国内外报纸期刊,尚未能足够重视,存在严重的缺期、漏订现象,学生对于此种情况日益不满。为能及时满足广大学生阅读需求,章氏夫妇特将自己积年所购藏的两千多种中外文书刊、报纸,无偿捐赠于北大图书馆,及时解决了广大师生的阅读需求^①。除此之外,在如何处理图书馆日常工作上临时出现的特殊问题,章士钊和吴弱男也成了李大钊的助手和顾问。正是在章士钊、吴弱男的鼎力支持帮助下,李大钊很快适应了图书馆主任职务的相应要求,并且勤恳地作出了相当的成绩,赢得了好评。1920年7月8日,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主持召开的北大评议会特别会议上,决议通过:“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李大钊成为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不久又被举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之一,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决策层占有了重要的一席。

1919年3月,南方军政府和北京政府举行所谓南北和平会议,章士钊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之一,常驻上海参加会议,会后又常驻广州,继又赴欧洲游历,至1922年底始返回国内,约有四五年时间未能与李大钊有接触的机会。时李大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北方地区的民主运动,几无不唯其马首是瞻。据有关介绍说,1923年春李大钊曾约请章士钊投身当时的民主运动,与之共同奋斗。章士钊本人也曾有回忆说:“一九二二、二三年之交,……守常则时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然吾之赋性,最为守常所了解,相视而莫逆者,则吾实乃一个性特重,不适宜于群众运动之人也。”^[1]两人之间虽情好谊笃,但因彼此赋性与思想取向不同,已是碍难一起共事了。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北京临时政府总执政组织临时政府,章士钊竟加入了执政府内阁,任司法部长,后又兼任教育总长,竟然大举整顿学风,镇

压学生运动,尤有甚者还重新发行《甲寅》周刊,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攻倒算,因是恶名远播,招致一片骂声,以致令李大钊对这位好友失去了信心,逐渐与之疏远,几乎断绝了交往。万般无奈之下,李大钊对其夫人吴弱男说:“行严沈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其时,李大钊坚持每周两次亲至章士钊住宅辅导他的三个儿子的学业,并为其讲授社会学;与此同时,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依随吴弱男为其义女,李大钊的夫人亦经常到章宅存慰,彼此时来时往,饮食谈天,“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1]。

1926年11月前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全部权利,疯狂逮捕革命进步人士,形势日益恶化。李大钊遂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旧俄兵营内,希图继续安全地开展工作。翌年2月,张作霖以战事吃紧,京师治安至关重要为由,调动大批军队入京,监视、抓捕进出东交民巷的一切革命进步人士。章士钊获悉李大钊处境极为危险后,依然不忘旧情,当即密告李大钊尽快出京暂避,并由其夫人吴弱男假托为其子办理出境护照,到东交民巷俄使馆约见李大钊面谈,请李大钊及早考虑出京避难,并建议李大钊化装潜行,先到章士钊住宅暂避,而后设法出京赴俄。应该说,这确乎是一个可行的秘密计划。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于4月6日晨张作霖竟密令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俄大使馆及旧俄兵营等办事机构,逮捕了李大钊及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的办事人员。寄居天津的章士钊闻讯后,即刻由津遄返京城,分别走访当局相关要人,“犹冀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谓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谈说经济理论阶段,不宜究治,可判守常等有期徒刑……”未料军阀当局的京外十一将领张宗昌、褚玉璞等联名发出电文,“坚称李(大钊)等并非仅谈空洞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非严惩不可,守常等遂终于牺牲”(见吴弱男《李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4日、15日、16日、17日。

大钊烈士数事》)。

李大钊遇难后,吴弱男曾当即赶赴李宅慰问遗孤,知悉其家所余家用仅有银元一枚后,随即出面集李大钊生前友好,商拟筹集赙金,经多方奔走很快集得二千多元,除支付棺木葬仪等支出近千元外,余存一千余元,委托李大钊生前友好白眉初、陶玄等人组成管理小组,以息金维持遗族生计。吴弱男出面为李大钊后事集金及办理葬仪,其幕后自有当时不便公开露面的章士钊出谋划策,因此,当时中日报界记者在报道有关详情时,用语多为“昨仅章士钊夫人及中日报记者数人往慰李夫人”,或“前总长夫人出面为李大钊料理葬事”等,总之,是不肯忽略章士钊的关注与作用,从而更加彰显出了章士钊与李大钊的交谊,“岂寻常风义所可限哉”!

1950年夏,北京大学师生为学习、纪念革命先烈李大钊,将红楼内原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辟设为“李大钊同志纪念堂”,以百余帧图片及相关资料公开陈列了李大钊生平及光辉事迹,供广大师生观览。章士钊亦曾往观,并于观览之后,题诗一首,诗曰:“隙尘何微微,朝夕通

(上接第21页)

第三,李大钊的历史解喻说具有系统性的特点。

他的解喻说不是在他的著作中的个别地方偶尔提及的,而是反复提及、反复阐述的。他的历史解喻说不仅包括历史观的内涵而且涉及认识论的基础,在方法论上也提出很多明确的、可行的途径。尤为可贵的是,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成果的构成和文字的表述都要有艺术的特征。这样一个明显具有系统性特点的思想理念,对于构建当代史学的话语体系无疑是值得参考的。

李大钊史学理念的这些特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他所说的“史学的幼稚”问题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用新的理念和方法解喻历史,使历史研究真正达到科学的高度依然有待努力。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等著述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研读,正是在于他没有那种经验主义倾向,即偏重于总结史学界

其辉。人生各有托,君去独不归。青林有蝉响,赤日无鸟飞。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衣。”上款题“守常老兄”,下款书名“士钊”。诗幅陈列之后,观者认为此是章士钊挥泪手书的思念老友的真情之作。

不宁唯是,即在李大钊逝世二十五年后的某日,当章士钊再次追忆起他与李大钊的交谊时,曾谓:“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1]对于章士钊的这一忆述,闻者皆以为是十分确当的。正所谓:挚情可鉴,俨如清塘。

参考文献:

- [1] 章士钊. 李大钊先生传·序言[M]//张次溪. 李大钊先生传. 北京:北京宣文书店, 1951.
- [2] 蔡元培. 蔡元培书信集[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 [3] 章士钊. 章士钊全集:第7卷[M]. 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李秀荣)

过去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试图给人们从事史学研究以路径上的指引。而李大钊则突破了传统的框架,吸收了当时中外学术思想的最新成果,指出了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的研究而必须遵循的途径。他的思想的高度在当时是无人能企及的,即使在今天他学术思想中的一些亮点也常常为人们所称道。因此,李大钊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那些历史解喻的理念和方法对于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时仍然具有很多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2] 瞿林东.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2): 21-27.

(责任编辑:李秀荣)